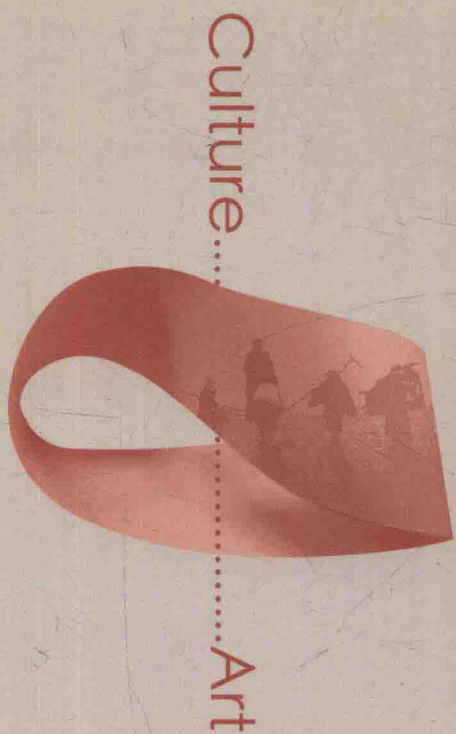


张同胜 主编

文化记忆与艺术新形态

——以《西游记》的记忆空间为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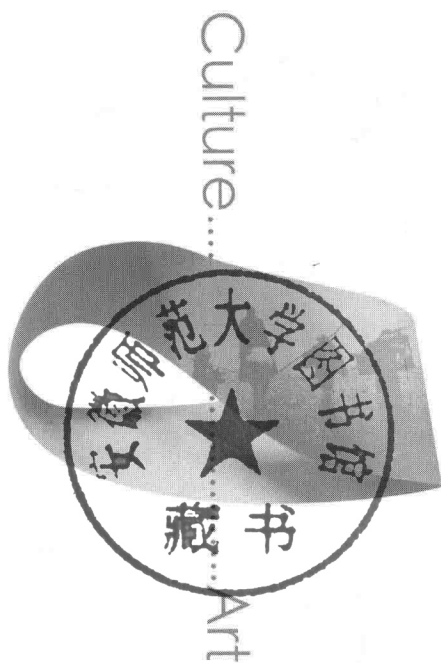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张同胜 主编

文化记忆与艺术新形态

——以《西游记》的记忆空间为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化记忆与艺术新形态：以《西游记》的记忆空间为中心 /

张同胜主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5

ISBN 978 - 7 - 5203 - 0272 - 2

I. ①文… II. ①张… III. ①《西游记》研究 IV. ①I207.4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94573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刘志兵
特约编辑 张翠萍等
责任校对 张依婧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4.75
插 页 2
字 数 405 千字
定 价 9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小引	张同胜 (1)
《猴子与僧人》前言	余国藩/著 李 晶/译 (3)
新见基石画像《唐僧师徒取经归程图》辨识	蔡铁鹰 吴明忠 (9)
从《西游记》序跋看其原旨与接受	王 平 (14)
《西游记》的迷踪与密谛	杜贵晨 (29)
《西游记》的成书与俗讲、说话	张同胜 (41)
《西游记》研究的视点西移及其文化纵深预期	蔡铁鹰 (59)
从《西游记》隐含的藏文化臆测作者身份问题	王晓云 (70)
试述《西游记》神魔塑造对藏密宗的借鉴 ——以悟空束“虎皮裙”题材为中心	王晓云 (81)
三晋钹铙打造了孙悟空 ——关于《西游记》的早期形态兼答曹炳建、 杨俊先生	蔡铁鹰 (91)
《西游记·认子》曲谱本杂谈	胡淳艳 (104)
从孙悟空形象的原型精神谈起 ——兼及中国传统石文化中的济世精神	王 慧 (112)
《西游记》“紧箍儿咒”考论	王 平 (122)
大鹏形象的演化及文化意蕴	樊庆彦 (136)
唐僧形象的变迁史	臧慧远 (150)
试论猪八戒的原型为瓦拉哈	张同胜 (158)
《西游记》中的“九头鸟”记忆	胡 朗 (169)
沙僧的印度血统试探	张同胜 (179)

一群卑微的神祇

——从“土地神”的渊源流变看《西游记》

中的“土地” 王 婷 (189)

西藏文化与《西游记》关系纵深研究预测 王晓云 (202)

《西游记》定身法素材源于西藏说 王晓云 (214)

《西游记》元神出窍、变化题材为藏汉“离魂”

故事之合璧 王晓云 (222)

金箍棒、金刚杵与橄榄棒 张同胜 (231)

《西游记》中“六贼”的概念人物化叙事论略 张同胜 (245)

《西游记》“金丹大道”话头寻源

——兼及嘉靖年间民间宗教对取经故事的

引用和改造 蔡铁鹰 (253)

袈裟、象狮、金凤、大鼋、骷髅、名字制敌及其他 刘洪强 (263)

丝路文化与《西游记》 张同胜 (277)

“西游戏”与《西游记》的传播 王 平 (290)

金猴奋起千钧棒：从“力敌”到“智取”

——新中国猴戏改造论 白惠元 (301)

西游记·西游戏·西游宝卷

——“江流儿”故事演变考论 车 瑞 (323)

张掖大佛寺取经壁画应是《西游记》的衍生物 蔡铁鹰 (332)

民族话语里的主体生成

——重绘中国动画电影中的孙悟空形象 白惠元 (338)

影视艺术中的《西游记》文化记忆 周仲谋 (352)

《大话西游》对《西游记》的解构 徐爱梅 (363)

西游：青春的羁绊

——以今何在《悟空传》为例 白惠元 (370)

后记 (389)

小 引

张同胜

本书的选题为“文化记忆与艺术新形态——以《西游记》的记忆空间为中心”。主标题很大，主要有两点考虑：一是某权威期刊的编辑曾经好意地提醒该期刊只发“大题目和理论方面的论文”；二是如果题目具体，发论文标注项目基金时会牛头不对马嘴，而此现象比比皆是也。因此，弄一个大题目，庶几少受限制。副标题限定了一个具体的角度，是由于项目的展开和论文的撰写，当有一个把手，亦即前贤时俊所谓的“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之意也。经常读到一个天大的题目，天底下却零星散放着几块石头、沙土，深为之惋惜。学术探讨一个具体问题，较为切实。然而，中国内地学者似乎长于大题目，作战略性的应然文字。从而，该选题便是妥协和现实的产物。

文化记忆理论，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德国的阿斯曼。文化记忆几乎等同于人类所有的知识，它指向一个文化认同的问题，涉及民族学、人类学、考古学、艺术等多学科，是一门跨学科的研究，属于比较文学的研究范畴。艺术新形态，其中的“新”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记忆空间，即广义的文本。诸凡俗讲变文、史传文献、传说故事、变相、说话、戏曲、石刻、瓷器绘事、寺庙、宝卷、小说、动漫、影视、网络、游戏等皆为记忆的空间。以《西游记》的记忆空间“为中心”而非“为例”，亦出于为所编论文集留有余地的考虑。因此，本着《西游记》大文本的文化记忆，探讨民族精神的认同，便是本编的初衷。

书店中的大多数“书”，是知识的堆积，甚至是常识的重复，然而，这并不是学术。专著或论文，是发表学术研究的形式，本无高下之分。然而，一般来说，真正的学术论文，是若无新意便不能发表的；而书包括专

著则只要有 15% 的创新即可。鉴于此，与其兀兀穷年写成专著，不如集思广益、荟萃精华编成一部论文集。但凡紧扣主题，独具慧眼，看到了他人所没有看到的；或识见高明而视野开阔，具有独得之见的佳作篇什，皆汇为一编。本编唯以质衡文，不看出身。而唯出身论的意识，在赤县神州根深蒂固而又无所不在。学术成果的评价，唯刊物或出版社的级别马首是瞻，因此专家学者找关系、花巨资发核心或所谓的权威而不愿意贱卖自己的成果，从而使得该编主要来自好友与师门的援手，但缘于皆为新颖别致的发现或发明，便既令人感动又令人欣慰。

2016 年 9 月 17 日

《猴子与僧人》前言

余国藩 著

李 晶 译

美籍华人学者余国藩教授 (Anthony C. Yu, 1938—2015) 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宗教与文学博士, 曾执教于芝大近四十年, 是《西游记》第一部英文全译本的译者 (全书共四卷, 于 1977 年至 1983 年出齐); 后应读者要求, 从全译本中拣选内容并修订, 打磨出节译本《猴子与僧人》(*The Monkey and The Monk*), 2006 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此文系他为节译本所撰前言, 文中简要介绍了《西游记》原著的演变过程、内容要略、人物形象、宗教特色及作者的著作权问题, 并交代了自己译介《西游记》的缘故。此文过去未见中文版, 此处译出, 祈就教于同好。——译者记

《西游记》的故事梗概建立在著名的唐僧取经故事的基础上。玄奘 (596?—664) 从东土大唐出发, 去往遥远的印度求取当时大唐没有的佛家经卷, 对他信奉的那一支教宗而言, 这些经卷都是经典。玄奘出发时是遮遮掩掩的, 因为当时的皇帝唐太宗 (ca. 600—649, r. 626—649) 明令禁止国人去往西方边境。这种违禁行为一旦有人发现, 他有可能获罪被捕甚至会被处死。不过, 到他回国的时候情况就好多了。玄奘的取经之旅漫长而艰苦, 前后迁延了将近 17 年 (627—644), 回到大唐之后, 不仅取回了 he 想要的真经, 还迅速获得了皇家的认可与资助。皇帝将他安置在当时的国都长安 (当今的西安), 他在那里度过了余生的 20 年时光, 成为翻译印度佛教文献的大师。朝廷下令帮他招募了一批合作者, 他带领这些人为中国百姓将大量佛经译成了中文, 共计 75 部或 1341 卷, 这一成就超

越了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经卷翻译者，后来也无人能及。直到今天，相关地点（譬如玄奘埋骨之处大雁塔）和他身为佛教领袖奉献毕生精力的遗址都还在，游客到西安都可去游赏。

在虔心事佛的伟业中，完成此类长途跋涉者不独玄奘一人。不过，在中亚和印度可见的关于他这段经历的记录与记载（有他本人的，还有他去世后众弟子写下的）都使得玄奘成为中国历史上声名最为卓著的宗教人士之一。他走到了丝绸之路一带及更远处，其间忍受的种种困顿与磨难，在旅途中每个阶段的宗教活动，他那难以抑制的精神担当与令人惊叹的学术成就，以及皇家给予他的隆重恩遇，所有这一切合力将他塑造成一名文化英雄。然而，这位英雄的故事在民间与文学想象中的记载迅速偏离了已知的史书与史实，变得独具特色。过了千年之后，通过各种媒介，无论是口耳相传还是笔墨故事（文字片段、诗意短文、散体短篇小说、形制成熟的戏剧，还有长篇白话小说），到明代演化出了最终版本，成为尽人皆知的四大名著之一。至此，《西游记》已从一位俗世僧人的朝圣功绩演化为这样一个取经故事：带有奔波探险、奇幻想象、幽默谐趣、社会讽刺与政治讽刺，以及建构在错综复杂的宗教融合物之上的严肃讽喻。这部由取经之旅演变而来的虚构小说里面，有三大要素。

第一大要素关系到这位取经人的来历与性情。与有据可考的历史背景及玄奘经历完全相反，戏剧或宗教性文本（譬如明代晚期出现的各种“宝卷”）等虚构文学中的唐僧身世是这样的：他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出生长大，当初父亲遇害身亡，母亲居孀，被强盗掳走强暴，生下他之后将他遗弃，一家寺庙的长老收养了他；长大成人后，他为父母报了仇。如眼下这部节译本中第八至十三回所述，佛家的“天意”在故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一切因由最终都导向唐朝皇帝选择玄奘来做取经人。在这部重新书写的历史中，平民僧人本身的宗教热忱改换成了多重动机，烘托起了这份宏图大业：佛祖慈悲为怀，发愿将佛家经卷作为普度众生的礼物，赐予东土大唐罪孽深重的中国人；与之对照的还有小说中取经人的宗教奉献与政治忠诚（对于皇命与皇恩）。史书记载的取经之旅虽为一位虔敬热忱的僧人秘密起程的越规行为，小说中的这趟旅程却是佛祖预先晓谕的，又有观音（中国各宗教中最得人心的慈悲女神）全程照拂，并且是受唐朝皇帝热情委派的。

这次虚构化旅程的第二个鲜明特色在玄奘收下一位形似猴子的徒弟时

出现。这位动物样貌的护卫型侍者身怀无穷无尽的智慧与神通，此形象与取经人之间的联系早在12世纪流传的故事片段中已然可见，后来的叙事文学中又有发展，不过，直到晚明这部长达百回的小说中，这位形似猿猴的角色才得到了最充分、最引人入胜的详细描绘。小说中为玄奘首徒赋予了重要意义，从章节的铺叙中即可看出：开篇整整七回的内容都在叙述孙悟空的降世与成长，他在玄妙的道家修炼中的训练与收获，以及他上天入地无所畏惧的探险，直到大闹天宫的高潮——这些片段足以当作独立的故事来读，也的确改编成了京剧及其他戏曲作品。孙悟空被佛祖亲自出马制服并囚禁起来，后来一旦皈依佛教，就成了玄奘最有本领、最忠诚的弟子。猴子那片刻不宁的灵性、武力与法术，还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都让现代中外读者想起其他文化里另一位猿猴似的英雄：伟大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Ramayana*）里的哈奴曼（Hanumat）。该史诗相传为诗人跋弥（Valmiki，又译蚁垤）所作。20世纪20年代至80年代之间，学术界在这两个故事之间的关联性上一直含糊其词，原因首先在于一直未有可为据的文本或史料。不过，更晚近一些的研究终于渐渐发现了一些文献，有可能从不同方面说明：佛教重要文献中的罗摩衍那故事自从译成中文后已广泛流传。不仅如此，除了两位神猴形象特征的高度相似（都有打斗中的勇气与本领，都会飞，都惯于钻入敌人腹中制敌）外，两个故事中还有一些惊人的类似，如多处描写细节和不同片段的情节等，无不令人怀疑，这些若说是巧合，不如说是一种更充分的阐释。

玄奘踏上朝圣取经之路时，他的小团队已扩展到五个成员：一位僧人带着四个徒弟：猴子之外，还有一个半人半猪的喜剧性角色（实为从天宫贬落人间的道家神仙），一个被感化过来的食人怪（另一位遭贬的道家神仙），一条年少犯错受罚的小白龙，化身为马充任坐骑。这种已知的历史与长篇小说之间的鲜明对比标志着取经之旅虚构化过程中的第三个显著演变。前者系一位虔敬僧人的独自奉献，后者则代表着一组虚构角色的综合影响。这些虚构角色在故事中又可从多方面来理解——作为某种人格的不同方面，或是一段征程（某种内在探索，无论是关于道德上的自我修炼、精神的启蒙，或是修炼长生不老之术）中的多项要素，再或者作为一个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个体。进一步而言，这个小团队组成的世界蔓延到了整个天地，无论是自然社会还是超自然的，都由古代中国社会多文化的

宗教想象生发而来。

叙述者的声音贯穿了整个长篇故事，虽不张扬却无处不在。事实上，这个声音提供了一种连贯的自发评论——通常是通过插入段落和新故事段落开始前的散体文简介——温和地提醒着读者，此处或许会有讽喻出现，即便是在妙趣横生的生动描述中，譬如关于喜剧性的打斗、稀奇古怪的角色、非同寻常的经历还有格外精彩的精神或体能上的精湛技艺的展示。为了塑造出一个与佛教史文献迥然不同的故事，作者明显大量运用了谚语和专门用语，其来源既有道教典籍，还有一个通常称作“三教合一”的变动不居的潮流，此潮流自宋代肇始并繁盛，到了封建社会晚期，已经深入上至官府精英，下至商人、书吏等各个阶层，乃至平民百姓当中。明清时期，这一潮流常在小说及小说评批中流传并格外鲜明。这种“合一”真正是一种阐释学意义上的混合，传统儒、道、释中各种大不相同的概念、类别被有意地融为一体。从原著第二回中须菩提吟咏的诗句中可见，我们的小说作者对此知之甚详。这位不知何宗何派的大师第一次向美猴王传授长生之道等神奇本领时吟道：

说一会道，
讲一会禅，
三家配合本如然。

此处提到的“三家”自然是指上述三种宗教传统。关于这一宗教合并，另有一处更明确的指示出自佛祖口中，小说开始不久（第八回），他声言这些经卷“乃是修真之径，正善之门”。到故事结尾处（此译本的第二十八、二十九回），更加健谈地提到，这些经卷“虽为我门之龟鉴，实乃三教之源流”。古往今来真正的佛教徒听到这种说法应该都会震惊不已的。

谁是这部想象力恢宏繁复的叙事作品的作者呢？这部长达百回的小说足本于1592年在南京出版（公认最早的权威版本），但既无匿名编者也无具名出版商，更无序言等内容的作者，可为这个问题提供一丝半缕的线索。中国学者从20世纪初的数十年间已开始集中关注明代小官吏吴承恩（ca. 1500—1582），认为他很有可能是小说作者，根据在于吴承恩是一位

诗艺高超又非常多面的诗人（对得上散布于全书叙事中共计一千七百余首各种类型与风格的诗词），另外他还喜爱怪谈异事的传说与作品，又以善讽刺和写作谐谈著称，是东南沿海地区淮安人。自17世纪以来，读者明显可以看出，《西游记》的叙述语言里含有大量口语化的表达，那种特殊的方言正是淮安话。重中之重的一点还有，明代天启年间（1621—1627）的淮安县志中，吴承恩的名下列有数种作品，其中赫然有《西游记》在内，尽管后来再无研究者发现过确凿信息，能够确定这部《西游记》究竟是什么作品。

这些关于吴承恩著作权的争议自然不应无视，也就无法得出公论说他就是小说作者，现代日本与欧洲学术界也不断质疑。更近一些时候，中国有些学者再次探寻统一道教某些分支的历史，试图找到关于《西游记》作者身份的线索，以及原著的问世背景。虽然作者难明，这部小说却从出版之日起就赢得了广泛阅读，不仅在中国各地区、各社会阶层中，过去四个世纪以来，通过越来越多的翻译和不同媒介的改编，也在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和地区传播开来。改编形式有图画书、漫画、游戏、京剧与地方戏、皮影戏、广播节目、电影、电视连续剧，据报道还有一部西方歌剧也在制作过程中，此外还有英美人士的多种改写，譬如毛翔青、汤婷婷、玛丽·齐默尔曼、黄哲伦等。^①

我为《西游记》劳神耗力始自1970年，动机有二：一是希望能纠正阿瑟·韦利节译本中描绘的故事，该译本备受欢迎与赞誉，却扭曲了原著^②；二是想重新平衡对原著的评论，学者外交家胡适博士曾为阿瑟·韦利的英译本写过一篇有影响的序言，断言“《西游记》与佛家、道家、儒

① 毛翔青（Timothy Mo，1950—），英籍华裔小说家，1978年出版首部小说《猴王》（*The Monkey King*, Faber & Faber, HarperCollins），后多次重版；汤婷婷（Maxine Hong Kingston，1940—），美籍华裔女作家，伯克利大学教授，1989年出版《孙行者》（*Tripmaster Monkey: His Fake Book*, Knopf），获美国西部国际笔会奖；玛丽·齐默尔曼（Mary Zimmerman，1960—），美国戏剧导演、剧作家，1994年将《西游记》改编为舞台剧剧本 *Journey to the West, A Play*，2004年出版（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书前有余国藩撰写的前言；黄哲伦（David Henry Hwang，1957—），美籍华裔剧作家，曾撰写剧本《猴王》（*The Monkey King*，又称《失落的王国》，*The Lost Empire*），2001年拍成电影，同年也拍摄成了一部电视迷你剧。——译者注

② 参见《猴子：吴承恩所著中国通俗小说》（*Monkey: Folk Novel of China by Wu Ch' eng - en*），阿瑟·韦利（Arthur Waley）译（New York: Grove Press, 1943）。

家批评者的一切讽喻性的解读无关，纯为一部幽默之作，多有无稽之谈与善意的讽刺，再就是令人开怀的娱乐”^①。我在儿时最早接触这部精彩小说，先祖父亲自为我开蒙，教法温和而不乏技巧，他正是用《西游记》做课本来教我读书识字的。那是在大陆，日寇侵华时期的战乱年间。那段学习使我深信，这部叙事作品恰恰是世界上最精妙的讽喻之作。后来我花费了13年钻研、翻译此书，又在芝加哥等地数十年间为学生讲授这部作品，由此成为一名快乐的见证者，见证关于此著的学术研究与阐释的各种新转折。大家远程合作的研究结果已经证明，宗教内容不仅对小说的接受与成型至关重要，也几乎是此著中承载的独特内涵，并且这种内涵不必与“幽默，无稽之谈与善意的讽刺，再就是令人开怀的娱乐”相冲突。

1983年，我翻译并注释的《西游记》英译本出版，是此著的首部英文全译本。^②不过，这个全译本未能逃脱命运的讽刺。四卷本刚出齐不久，远近的朋友与同仁就纷纷抱怨全书篇幅太长，太不切合实际——对一般读者阅读是这样，用作教学用书也是如此。年复一年，我都抵挡住了他们的请求，没有动手裁出一个缩略版。不过到如今不得不说，韦利教授的节译本自有道理——尽管眼下我这个缩略版仍旧尽量有别于他的译本，尽可能地将选译诸片段的文本特色淋漓尽致地传达出来（自第十六回开始，每回开端都用数字括注了本回内容对应四卷全译本中的哪一回）。感谢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提供机会为我出这个节译本，还要谢谢他们在拼音方面给我的技术支持，帮助我将罗马化字词转成拼音并作出大量修订。我非常期望这部“折扣”版小说在文学效果上不要打折扣，并能唤起读者共鸣，进而乐于去领略全译本的丰饶内容。

2005年8月

译者单位：中国国家图书馆

① 《猴子：吴承恩所著中国通俗小说》（*Monkey: Folk Novel of China by Wu Cheng-en*），阿瑟·韦利（Arthur Waley）译（New York: Grove Press, 1943），第5页。

② 参见余国藩（Anthony C. Yu）译注《西游记》（*The Journey to the West*）四卷本（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7-1983）。

新见墓石画像《唐僧师徒 取经归程图》辨识

蔡铁鹰 吴明忠

2014年春夏间，有网友发来一幅取材于唐僧取经故事的石刻画像拓片并让笔者鉴定一下。拓片让人眼前一亮，甚至有点兴奋：以对唐僧取经故事各类资料的了解，笔者判定这幅石刻画像应该不迟于元代，而且有可能早在宋金——如果这一判断能得到证实，那它就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唐僧师徒四人一马的取经图，代表了《西游记》取经故事形成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演化阶段，对于《西游记》成书研究有非常的意义。笔者与网友取得了联系，表明了笔者的意见，网友说，这确实是在一座金代墓葬中出土的，墓中伴有一块署有确切年份的墓志铭刻石，但墓志已经不知去向，而且由于种种原因，他无法提供进一步的线索。这是一件很遗憾但又无可奈何的事。为表示对《西游记》研究的支持，这位网友最终同意将有关资料公之于同好——这当然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由于这幅石刻取经故事图像上有完整的师徒四人和白马驮经的情节，因此我将其命名为《唐僧师徒取经归程图》。以下介绍石刻图和笔者对这幅图绘制时代的认识。

这确实是一块墓道的门框。全长120厘米，高26厘米，其中门楣部分高14厘米；门楣下有四颗门钉，约6厘米见方，刻有不同的花纹；门楣上隐约可见的阴刻图像，即我命名的《唐僧师徒取经归程图》。

《唐僧师徒取经归程图》占据了整个门楣的中心部分，除去两侧山水，中间四人一马大约占据了55厘米的宽度。由于岁月留下了痕迹，原石已经显得很沧桑，只能在各种划痕中隐约见到一些淡淡的阴线，但在拓片中，我们可以辨认出一幅清晰精美的《唐僧师徒取经归程图》画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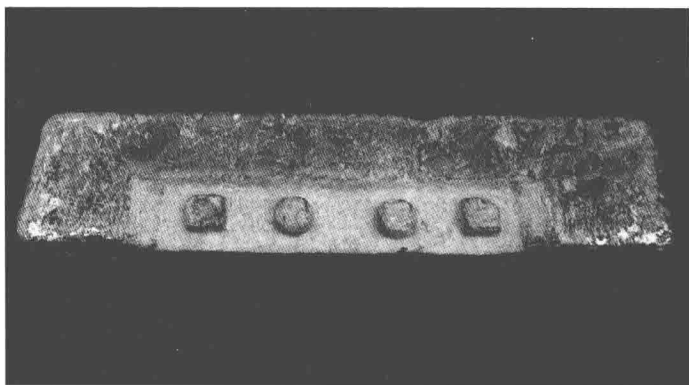


图1 《唐僧师徒取经归程图》原石正面



图2 墓道门楣上《唐僧师徒取经归程图》人物局部

画像中右侧为前方，师徒四人一马自左向右前行，正符合取经归程的方向。悟空头戴东坡巾在前，呈大踏步向前的姿态，有棒夹在左腋下，右手搭在额头，作回首眺望状，似乎是在招呼随行众人；悟能八戒紧随其后，左肩挑经卷担，右手提衣襟跨步，作努力前行状；再后是白马，鞍具华美，驮有经卷；白马后面跟随的是悟净沙和尚——一个白白净净的和尚，兵器在左肩，似乎是月牙铲之类；队伍的最后是唐僧玄奘，头戴毗卢帽，双手合十，背后有佛光。整个画面动感十足，人物姿态生动，线条尤其优美流畅。

据介绍，这块墓道门框出现在河南某地，墓内原有一块墓志石，铭文署有明确的落款“大定三年”即南宋孝宗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但这

块墓志石后来不知去向，目前也无法获得更多的线索。从《唐僧师徒取经归程图》的艺术水准来看，显然不是一般民间工匠的活计，这也显示出墓主人绝非等闲之辈，因此墓里有墓志出现也是合理的。但缺少墓志实物，为考证《唐僧师徒取经归程图》留下了巨大的遗憾，所谓“大定三年”就成了悬浮的说法，我们必须从另外的角度来解释把它定为宋金器物的理由。

如前所述，笔者在知道“大定三年”墓志铭存在之前，已经作出了它应该出现于元代之前的判断，理由何在？现在进一步相信有“大定三年”的可能，理由又何在？

首先，有证据表示师徒四人一马的队伍在元代之前已经形成，这是取经故事演变的大背景。主要证据，一是广东省博物馆藏有一元代瓷枕，所绘彩图为取经故事，四人一马；二是山西曾发现一本民间祭赛用的《礼节传簿》，其中有金元队戏《唐僧西天取经》的角色排场单，提到取经也是四人一马。瓷枕已经经过鉴定，属于元代耀州窑，年代没有疑问。^①

其次，取经故事中，“归程”的取经故事更为早出，我们现在看到的早期的取经图，都是表现取经的归程，也就是都显示取回了经卷。如敦煌榆林窟3号窟的取经图，只有二人一马，马背上驮经卷，马就是驮经的；榆林窟2号窟的取经图，千佛洞2号窟的取经图都是如此。而在元代瓷枕取经图上的马用于骑乘和有了华盖就是明显的被改造过的世俗化的东西——这清楚地表明了一个事实，就是取经故事是从玄奘法师的归程开始生发。这与文学上民间流传故事一般都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变规律是吻合的。因此现在我们看到的《唐僧师徒取经归程图》要早于瓷枕的取经图。

最后，最重要的是，《唐僧师徒取经归程图》中人物服饰显示了时代的特征。请注意，悟空头上的帽子叫东坡巾（或称“程子巾”，以程氏兄弟命名；“山谷巾”，以黄庭坚命名，大致相似），这是典型的宋朝人服饰。东坡帽是否由苏轼首创暂且不论，但肯定是在宋代流行的，这具有时代的标志意义。金人入主中原，带来了自己的民族服饰习惯，但不久就被同化，汉人服饰没有太大的改变；元人立朝后，再次改变服饰，这次就有

^① 关于队戏《唐僧西天取经》的年代问题，请参见蔡铁鹰《西游记的诞生》，中华书局2008年版。

了比较彻底的新面貌,《明实录》“初,元世祖起自朔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变易中国之制,士庶咸辮发椎髻,深檐胡俗,衣服则为裤褶窄袖,及辮线腰褶,妇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无复中国衣冠之旧”,所以我们在后来的各种取经图中再也没有见过这种冠戴,比如在元代瓷枕取经图中,孙悟空头上就没有了“东坡巾”之类的头巾。图3是几幅资料图,前两幅程颢像、黄庭坚像来自网络,不知道具体出处,似乎是截取自某一书画藏品,他们的头饰略有差异但都被后人统称为东坡巾;后两幅即苏东坡像:一是扬州三贤祠宋刻东坡像,有清代鉴赏名家端方题款;一是截取自湖北黄冈东坡赤壁的同治石刻东坡像。



图3 宋人巾帽资料